

威海卫抗日武装起义经过的回忆

孙明光

(一)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抵挡不住日寇的疯狂进攻。平津失守，华北告急，上海沦陷，南京受胁，国家存亡，危在旦夕。在此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抗日救国、力挽狂澜的伟大历史使命，坚持全面抗战，全民抗战，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国共合作，各党派大联合；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组织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誓与日寇血战到底。

“七·七”事变前后，我正在山东省“学联”、省“各救会”和“民先”山东省队部工作。同年秋，日寇侵占平津后沿津浦路南犯，十月初占领德州，进逼黄河北岸，隔河炮击济南，山东告急。我受中共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民先”山东省队部队长孙传文(陶林)同志的派遣，以“民先”山东省队部特派代表、山东省“学联”常委、省“各救会”常委的身份，专程去胶济铁路东段各城镇和胶东半岛地区巡视工作，整顿组织，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当时与我同去的有“民先”山东省队部的宣传部长武衡同志，“学联”、“民先”的骨干分子赵修德、薛绍庚、仲曦东等同志。我们从泰安出发，经过济南，第一站先

到潍县撞钟院小学校长丁小芦同志那里，找到了昌潍地区“学联”、“民先”、“各教会”和地下党的关系人王翼之同志，又通过上层统战关系会见了山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厉文礼，商谈合作抗战和选派部分政工干部到他的政训处协助改造旧军队的问题。我们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由武衡率领其他几位同志暂留潍县开展工作，我一人经青岛由海路转入胶东半岛的威海卫、烟台等地巡视检查工作，然后经蓬（莱）黄（县）掖（县）重返潍县，共商下段工作部署，并向省方汇报请示。十月底，我到达青岛，接通了山东大学的“学联”、“民先”关系后，迅即乘外轮直奔威海卫。在威海卫，我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上层社会关系，即我的胞兄、当时的管理公署专员孙玺凤（即孙鸣岗）。以这个关系作掩护，我就可以大胆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公开半公开的抗日救亡活动，对开展工作十分有利。

（二）

在威海卫，首先接触的对象就是我的胞兄孙玺凤和他的夫人吴孟班博士。当时他们虽然早已知道我是一个左倾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活动分子，但并不知道我的政治身份，特别是这次重来威海的使命（一九三六年我曾来过他处）。从表面看来，孙玺凤是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高级行政官员，但他既无党派背景，又无个人财产和政治靠山，只不过是凭借着法国留学生、巴黎大学国授法学博士这张文凭才跻身于政界。长期的留学生活，使他受欧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熏陶和影响较深，主张以法治国安邦。他回国后，对独裁政权的腐败无能、任人唯亲和派系斗争的

印象很坏。“西安事变”后，他赞赏中国共产党的联蒋抗日、国共合作的主张，拥护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早在三路军总部军法处任职期间，就曾营救、保释过我地下党员。在来到威海卫后，他集中精力应付外国舰队来威避暑期间发生的有关事项，致力于维持地方治安和禁烟禁赌。他明知共产党人在威海卫管辖区域内有隐蔽活动，但他不闻不问，不予追究。“七·七”事变后，开始他对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尚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几个月后抗战形势的演变，使他开始感觉到指望国民党政府来保卫祖国的大好河山是越来越渺茫了。他深知身为边陲官员，守土有责，但他当时既缺乏独立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思想准备，又找不到组织抗日武装的正确道路，因此他忧心忡忡，苦闷徬徨。例如，在军事上他担心海军不能听从他的指挥，甚至有可能和他对立；在政治上他担心威海卫的地方士绅中有些封建余孽和亲日派的投降叛变活动；在经济上财政收入微薄，难以长期坚持。

根据以上各方面情况综合分析，我认为他应该是我党争取团结联合抗日的重要对象，搞得好，通过他的同情和支持，我们可以较顺利地组建一支独立自主的抗日武装，作为联合抗战的基本力量，同我们一起走上抗日救国的光明大道，何况在山东省范围内已有先例。当时我们在鲁西北正大力争取聊城专员范筑先；在昌潍地区争取过厉文礼专员；在清河区我们也争取过长山中学校长马跃南。相比之下，我相信，孙玺凤肯定是可以争取的。取得组织上的同意和支持之后，我的信心更强了。

(三)

当时威海卫的主要抗日救亡力量，是以威海中学进步教师袁时若等同志为核心的一批“学联”成员和“民先”队员。部分小学教员、市政职工以及其他阶层中一些人士在“各救会”中也很积极。我和袁时若同志早已保持秘密联系。这次来威，又从“民先”山东省队部转来一个北平的“民先”关系，此人就是孙正谊（即孙端夫）。他是北平的大学生，曾奉命参加过韩复榘的政训班，毕业后被分配到威海卫保安部队政训处任主任。在他领导下约有三、四十名政训干部，多系爱国知识青年，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具有合法的政治地位和身份，可以直接插手保安部队的政治工作。当时他们正苦于和威海卫专员缺乏密切联系，开展工作有困难。我接通“民先”关系后，就帮助他们建立了直接联系。在海军方面，我通过从青岛转来的“民先”关系，找到了海军教导队中队长郝道逵和周军需官。这个教导队大部分也是爱国的知识青年，当时他们感到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部设在青岛，相距千里，一旦有事，从海上很难突破日寇的军事封锁；登陆作战，又怕得不到威海卫管理公署和地方官兵的支持。在他们处于报国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见到我的到来都很高兴，立即要求我给他们作抗战形势报告。参加听讲的人越来越多，情绪高涨，每次都向我提出一系列疑难问题要求解答。当时我用的化名叫王明光，所以他们只知道我是省“学联”、省“各救会”、省“民先”队部的代表，并不知道我和管理公署孙专员是同胞兄弟关系。

此外，在威海卫管理公署各部门、保安队、警察部队和

税警部队中，还有孙专员的一批亲朋故旧，以及他从三路军军法处带来的一批亲信。这些人在和平环境中大部分均可接受孙专员的领导和指挥，跟着他走，但在战争条件下能否拉得出去很难说，不过他的影响还是存在的。鉴于上述情况，我当时面临的政治任务，是迅速将这几股力量组织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有力的拳头，一支比较强大的抵抗力量。固守威海卫这个久不设防的滨海城镇不是我们的战略对策，但镇压惩办汉奸亲日派的妥协投降活动，打击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嚣张气焰，联合各方面的抗战势力，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坚持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则是可以做到的。

为了顺利开展各方面的工作，我与孙端夫、袁时若等同志经过初步酝酿，成立了威海卫“民先”队部，统一领导行政区的抗日救亡运动。由我暂兼队长，孙端夫分管组织工作，袁时若分管宣传工作。我们采取单线联系、分片包干的办法开展工作。管理公署和海军的争取团结工作，由我直接来抓，保安部队的改造工作由孙端夫利用其合法身份和地位去进行，威海中学和地方的群众工作，由袁时若负责。记得我当时的活动规律是：每日以半天时间秘密去郝中队长处给海军教导队中下级军官士兵讲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另半天时间去政训处或威海中学和孙、袁碰头，研究工作；早晚一日三餐的时间，则利用与兄嫂在一起的机会，谈论时事政治，交换意见，辩论问题；深夜，回到自己寝室为第二天的工作做好准备。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

(四)

我到威海卫以后，虽然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但急切需

要党的领导，而这时我与省里已无法联系，和潍县联系也有困难。于是便通过从省里带来的关系信，找到了中共胶东特委地下交通联络站的同志。这个秘密联络站设在管理公署至专员官舍这条马路旁边的一个烟酒小铺里。先几天我把从省里带来的一封密信交给一个卖烟酒的老头，他告诉我三两天后再来联系。我去后他转告我翌日午后三时在西山环翠楼前与一个小学教员打扮的女人接头，我准时按规定的联络暗号接通了这个秘密关系。她自称李紫辉。我简要地向她说明了我的政治身份和来威的任务，并告诉她我很快还要到烟台市和蓬、黄、掖三县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为了谈话方便，避人耳目，我们相约离开环翠楼到宝泉汤附近一家大饭店（东海饭店）二楼一间雅座中就餐，那地方比较僻静，有利于交谈。我向她作了详细的自我介绍后，她问了很多具体情况，我也都一一作答。这次碰头后不久，她秘密通知我按规定日期，只身一人前往文登县天福山一个偏僻的山村沟于家，通过张修己、张修竹兄弟俩去寻找一个负责同志。我按计划行事，在沟于家找到了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同志。我向他汇报请示工作，要求接受党的直接领导。他对我的到来似有所知，并不感到意外，对我在威海卫的活动很感兴趣。特别当我向他介绍我和孙玺凤的关系及其当时的思想状况、政治观点时，他多次插话说：你来得好，你来得正是时候；你从省里带来的政治任务我们同意和支持，但就威海卫的具体情况来讲，你应该暂缓执行西去的工作计划，就在威海卫利用你的特殊关系，大干一场，集中全力去争取孙专员同我们合作，结成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他还说，我们拥护孙专员领导威海卫人民走抗日救国的正确道路；我们主

张国共合作，各党派和一切抗日武装的大联合；我们应该帮助孙专员改造他的地方部队，我们更应该直接抓枪杆子，拉队伍，准备抗日武装起义，创立自己的革命队伍。为了加强特委对这项工作的具体领导，他当即宣布介绍和批准我为中共正式党员，并责成我回威后，立即发展孙端夫、袁时若两同志入党，迅速组成威海卫特别党支部，接受特委的直接领导，通过李紫辉同志的地下交通联络站保持与特委的密切联系。

我在沟于家与理琪同志取得了直接联系后，精神异常振奋。当晚潜回市内，迅即分别向孙端夫、袁时若两同志作了扼要的传达和介绍。按照理琪同志的指示和要求，几天之后就正式秘密建立起中共威海卫特别支部，我任支书，孙、袁两同志分别任组织、宣传委员。此后，威海卫抗日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就是在中共胶东特委和理琪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五）

我从特委回威不久，理琪同志派特委宣传部长林一山同志，代表中共胶东特委，秘密来到威海卫，通过我的介绍，第一次和孙专员直接见面密谈。地点是在专员官舍内我的寝室里，参加这次会谈的只有我们三人。会谈是在绝密条件下进行的。林一山同志是我在济南高中读书时的同学，就以我的老同学、老朋友的名义与我接触，不会引起他人的怀疑。这次会见的时间不长，仅仅一个晚上，但它的作用和政治意义极为重要，这就是从此建立起威海卫当权的行政长官与中共胶东特委的不寻常的秘密联系。

林一山同志代表中共胶东特委表示欢迎和拥护孙专员率领威海卫军民共同抗战。孙专员当面郑重表示：作为国家边陲的高级官员，守土有责，绝不会丧权辱国，妥协投降，卖国求荣。他赞赏拥护中共中央全面抗战的正确主张和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同情、支持我们党在胶东的抗日救亡活动，支持我们坚持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拉队伍，抓枪杆子，与日寇血战到底。但对他自己是否能在威海地区坚持敌后武装斗争，尚在研究考虑之中。他正在考虑的主要问题，根据我的回忆大体是：

第一，威海卫地处胶东半岛的东北一隅，自中日甲午战役失败之后，既没有建筑巩固的国防工事，更没有国防正规军驻守，少量海军第三舰队的官兵政治态度不明，且不归他指挥，仅有的保安、警察和税警部队，依靠它维持社会秩序尚感力量单薄，靠他们固守海港城市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取的。一旦日寇入侵，究竟采取何种有效对策，正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第二，根据抗战半年来华北华东两大战场对敌斗争的实践经验来看，日寇一旦强行登陆，阻击无效，只能避其锋芒作战略转移，转入游击战争。从威海地区的实际情况来讲，在这个狭长地区坚持武装斗争的迂回活动范围太狭窄，无后方作依托，困难甚多。诸如抗战经费从哪里来？武器弹药的消耗损失如何补充？伤病员如何安置？兵员的补充又如何解决？所有这些现实问题，事先必须有周密的考虑研究，有所准备，并有应变对策。做为一个地方文职官员，他对这些问题深感棘手。

第三，孙认为中共中央的全面抗战主张是正确的，地方

党的同志爱国热忱、革命意志，也令人钦佩，但仅凭满腔热忱是难以持久的。他探问我们对胶东半岛地区的抗战形势、对敌斗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有什么长远打算，并表示愿意倾听我们的意见，希望今后与我党保持秘密联系，联合抗战，共商救国图存大计。

林一山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我党的抗战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了扼要的阐述，对孙专员提出的一系列具体问题讲了某些个人意见，并答应将孙专员的意见带回特委研究后再联系。根据我自己的记忆，对这些问题在我们兄弟家庭之间不知已经探讨辩论过多少次了。

林一山同志回特委后是怎样向理琪同志汇报的，特委又是怎样讨论这些问题的，我不清楚，也没有接到特委对上述问题的具体指示。一切仍按原计划加快进行，工作进展比较顺利。从各方面搜集到的情况判断，威海卫管理公署与驻威海海军关系不睦，相互猜疑，互不相信。孙专员和公署一方怀疑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兼青岛市长沈鸿烈有亲日嫌疑，直接威胁到公署的安危；海军方面则怀疑孙专员和威海卫地方封建势力、亲日派汉奸有所勾结，一旦有事，驻威海海军将腹背受敌，无路可走。我深知孙专员绝不是什么投降派人物，也知道海军教导队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多数人均有爱国热忱，愿走抗日救国的道路。所以，我们就采取了疏通陆海军关系，消除相互怀疑的情绪，逐步走向联合团结的抗战道路。我向孙专员解释，根据我们的调查了解，海军士兵和中下级军官是爱国的，不管海军第三舰队司令沈鸿烈属何派系，有什么背景，在目前情况下，“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要他们对日屈膝投降是不大可能的，果如此，海军必然要四分

五裂，自取灭亡。对待海军教导队的爱国士兵和进步中下级军官，我则借讲课的机会，向郝中队长、周军需官做工作，说明根据我们的调查，这位专员不会对海军构成威胁，更不会对日妥协投降。但要他们采取共同行动，还要做艰苦的工作。

(六)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下旬，全国抗战形势继续恶化，太原、南京相继沦陷，胶济铁路已被拦腰斩断，济南、青岛已自动放弃，烟威地区形势日趋紧张。

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共胶东特委发动了天福山起义。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威海卫，震动了军政当局和商会的豪绅。商会会长刘福堂和常委戚仁亭等人暗中勾结公安局长郑维屏，密谋筹组“治安维持会”，迎接日寇登陆。他们听说共产党领导的起义队伍已临威海卫边沿，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和安全，就散布流言蜚语，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要求专员派兵防范，并通过公安局长郑维屏谎报军情，向孙专员施加政治压力。他诡称接到密报，有人检举孙专员的胞弟有共党嫌疑，不宜久留，建议尽快礼送出境，否则将对孙专员不利等等。但那时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判断，他们并不知道我的底细，更不知道此时此刻的孙专员业已和特委建立了秘密联系。因为孙专员心中有数，对他们的报告置之不理，并立即将此动向亲自通知我，要我们加强戒备，防止意外。戚仁亭、郑维屏一伙人的阴谋诡计未能得逞，于是就进一步密谋寻衅闹事，妄图制造无政府状态，裹挟孙专员对日妥协投降，或将其轰走。对于这伙人的各种阴谋活动，我们不仅早

有耳闻，且已有准备。因为两个月前我们在济南就曾发动过大规模的群众示威运动，严厉打击了华北地区的封建余孽、亲日派汉奸走狗马良等人妄图在济南市秘密筹划组织地方“治安维持会”，欢迎日寇的活动。威海、烟台地区，隔海与旅大相望，此时东北三省已沦陷七年之久，那里早已经打出伪“满洲国”的招牌，旅顺大连的伪商会与烟威地区的投降派，早已有所串联，并跃跃欲试。

(七)

一九三八年元旦前夕，威海卫形势日益恶化，管理公署电台与南京国民政府的电台失掉联系，日寇侵略军随时有强行登陆的可能。中共胶东特委指示我们加快工作进度。在我们日夜奔忙、积极组织领导抗日武装起义的同时，地方反动势力的阴谋活动亦日益猖狂。约在一月十五日午后三时左右，管理公署突然被来路不明的一群人所包围，他们在公署门前吵吵嚷嚷，要冲进办公大楼，要专员接见并回答他们的问题。当时专员正在家里午休。这群暴徒闻讯后即冲向专员官舍。孙专员接到密报，查明是戚仁亭与郑维屏一伙收买的一批地痞流氓聚众闹事，制造混乱，便下令公署保安部队立即戒备，并出动便衣武装据守公署和专员官舍大门，断绝交通，监视他们的活动。当时我正在宿舍准备讲课提纲，听到外面吵吵嚷嚷，就出来察看动静，只见大门外由东向西有一群身穿深杂色破旧棉衣的暴徒蜂拥而至，大门周围以至专员官邸、围墙四周均有便衣武装把守。我进屋去见专员时，他正在接电话，神情紧张，面有怒色。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商会闹事，公安局长态度暧昧，我正在调动保安部队以防事态

扩大。我看形势危急，当即从后院越墙赶到孙端夫同志家中，告知眼前发生的事情。当时我们来不及开会研究，便决定立即分头紧急集合，准备战斗。一，由孙端夫同志负责立即召集政训处全体政训员，跑步从后墙进入专员官舍，在我住室集合待命；二，通知威中袁时若同志立即召集该校的“学联”、“民先”成员和进步职工学生整队跑步前进，直奔专员官舍，从背后包抄；三，通知海军教导队郝中队长立即紧急戒备，准备增援，主要监视目标是郑维屏及其警察部队的动向，必要时予以夹击；四，通过地下联络站，迅速报告特委书记理琪同志。下午四时左右，我回到住处不久，孙端夫同志带队先到，紧接着袁时若同志所率领的青年学生队伍跑步赶来。门前暴徒在与公署警卫对峙过程中，发现专员官舍的小山包上便衣武装越来越多，革命群众正不断从四面八方包剿过来，形势变化对他们不利，于是就吵嚷着向东南方向溃散。在这场斗争中，孙专员亲眼看到我党组织领导的革命群众，忠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诚心诚意拥护地方当局抗日救国，处于危急的时刻，敢于挺身而出进行斗争，对此深受感动。就此机会，我向他建议，事已至此，不应该有什么顾虑，抗日救国，天经地义，正大光明，不应畏惧，凡属响应我们的号召，前来增援的革命群众，一律表示欢迎。除热情接待外，应尽快予以武装，以增强战斗力。孙专员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当即下令打开公署官舍和保安部队司令部两个武器库，交由我们负责处理。我们当场向大家发放了枪支、弹药、大刀和手榴弹，还有军用毛毯，随即武装编队，将专员官舍层层设防，准备战斗。刹那间，我的住室无形中变成了抗日武装起义的临时指挥部。黄昏前后，稍事整

顿休息，便下达夜间联络的绝密口令，并以白毛巾挽在左臂为识别记号。这时特支考虑的头等大事就是立即捉拿此次聚众闹事、阴谋制造混乱的幕后操纵者戚仁亭及与其相互勾结、严重失职的公安局长郑维屏。在征得专员的同意后，当即派政训处主任孙端夫同志率领部分政训员出发捉拿戚仁亭（因戚获悉事已败露连夜逃跑而扑空），我就亲率专员亲信警卫、射击能手两人，乘专员专车驰往公安局传讯郑维屏。门岗见专员专车到来，便持枪敬礼，不敢阻拦。我们直接闯入局长办公室，说专员有要事相商，立即召见。郑维屏作贼心虚，内心恐惧，不敢抗命，只好跟随前往。当他看到专员官舍的小山包上层层设岗，戒备森严时，更加恐慌。进了会客厅后，孙专员严词责问郑维屏：你身为公安局长，在此国难当头、人民遭殃的危急时刻，地方豪绅、反动势力收买地痞流氓聚众闹事，秘密组织“治安维持会”准备迎接日寇入侵，你知情不报，按兵不动，坐视歹徒包围公署，危及专员安全，是何用心？你到底想干什么？面对专员的训斥，和警卫人员怒目而视大有动武之势，郑当时面如土色，无言答对，只得低头认罪，以至双膝下跪叩头求饶。当时我曾建议就地正法，以除心腹之患，但孙专员认为要杀他根据不足，也不符合法律程序，并有孙夫人从中说情，最后还是令其检讨反省、戴罪立功，将其斥退。

斥退郑维屏之后，孙专员传令紧急召见保安部队、公署卫队和公署有关科局长开会，讯问各方面有关情况，要求大家坚守工作岗位，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

午夜前后，理琪同志带领的一支队伍出现在专员官舍门前。两支队伍胜利会师，群情振奋。我们向理琪同志汇报了

这场斗争的经过，得到了他的充分肯定，认为我们主动出击，行动迅速、果断，完全正确，当前的关键是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更大胜利。

鉴于理琪同志带来的人员缺乏武器装备，我们征得专员同意后，又给他们发放了枪枝弹药，转瞬之间，这些同志也都装备起来了。这两支武装力量的大联合，成了胶东人民抗日武装的核心骨干和基本队伍。

深夜，我陪同理琪同志与孙专员会见。因系第一次见面，专员对理琪同志星夜赶来，亲自领导这次起义斗争，表示欢迎和感谢；理琪同志表示欢迎孙专员领导抗战，感谢专员对中共胶东地下党的同情、支持和援助。鉴于时间太晚和日间的过分紧张劳累，彼此略事寒暄、互致敬意之后，理琪同志建议先让专员抓紧时间好好休息一下，白天再谈。

我们从孙专员那里出来，边走边谈。我又领着理琪同志围着专员官舍的小山包巡视了一周，看到起义战士在寒风中持枪戒备，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令人钦敬。理琪同志决定于拂晓前在我住室门前的广场上，召开全体起义干部战士大会，庄严宣布武装起义斗争的胜利。指定大会由我主持，主要内容是请理琪同志讲话并宣布命令。会上他说，由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威海卫抗日武装起义斗争在孙专员的同情和援助下胜利成功了，这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现宣布命名这支队伍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理琪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一山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孙明光同志任参谋长。他还说，我们是一支坚决抗日的革命队伍，要联合一切抗战力量，共同奋斗。理琪同志的讲话，博得全体干部战士的鼓掌欢迎。会后开始整顿队伍，扩大活动

范围。经初步商定：管理公署及其附近地区，由保安部队继续防守；专员官舍及其周围地区外部防务，仍由公署警卫队防守；内部防务由起义战士加以协助；其他起义武装力量迅速向纵深发展，延伸防区向市中心广场、海港码头栈桥等交通枢纽扩展，并随时准备战斗。干部战士精神振奋，斗志昂扬，纷纷要求乘胜前进，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抗战。为此请求召开威海卫人民群众大会，发宣言、发通电，宣传这次抗日武装起义的重大政治意义。面对当时的有利形势，党内外有人主张在市内安营扎寨，巩固阵地，多住几天，以扩大战果和政治影响；也有人认为我们这次行动的主要目的是抓枪杆子、拉队伍，这个目的已经实现，应即转移农村，上山打游击，且宜速不宜迟，夜长梦多。特委领导鉴于天福山起义和“岭上事件”的教训，决定迅速转移。

孙专员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立即将其眷属吴孟班及三岁的幼女孙子才乘当时英轮去天津法租界其岳父吴景濂家隐蔽，以解后顾之忧。在此前后，他还分别紧急召见了故旧亲朋、文武官员和工商各界有关人士，说明当前抗战形势，揭露汉奸亲日派的非法阴谋活动，征询了各方意见。这时他的心情异常复杂：汉奸亲日派的猖狂进攻虽然暂时被镇压下去了，但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公安局长郑维屏原为其心腹，就其目前表现，却反而成了他的心腹之患。当时山东的形势是，济南、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各主要城镇已经沦陷，一旦敌人来犯，腹背受敌，难以固守。若不经请示批准，过早撤退又怕舆论谴责，国法难容。自从近一两个月和中共胶东特委建立秘密联系以来，他曾反复考虑过能否在威

海卫这块狭长地带独立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有些具体困难已通过林弋山同志向特委提出，尚无明确答案。在我们家庭内部，两个月来经过多次激烈辩论，也未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这时的孙玺凤，正受国事家事、外患内忧所困扰。我虽然尽了最大努力向他宣传解释我党的方针政策、战略战术，力劝他留在敌后领导抗战，但对他提出的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困难问题却未能予以满意的回答。当时在他看来，我还是一个初出茅庐、年幼无知的青年学生，虽有爱国热情，但缺乏社会经验；通过与我地下党人的初步接触，印象尚好，但能否精诚团结，携手共事，还有某些顾虑，尤其感到困难的是缺乏军事指挥人才。他自知自己是一名文职官员，不懂军事，不能指挥部队；而驻威保安部队、公安武装均系旧军人，缺乏政治头脑；特委带来的队伍又多系农民，也无实战经验。他对我主力红军的军事指挥十分赞赏，但远水又解不了近渴。特别是当他得知理琪同志指定要我主管三军参谋工作时，更加深了他对我们的军事力量和指挥能力的关切和担心。最后，他获悉特委决定要立即率领起义队伍转移农村，他权衡利弊，决定暂离威海卫，由海路经香港、广州直奔武汉，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汇报请示工作。并执意要我跟在他的身边。

特委理琪同志同意、支持孙专员的意见，决定率领全体抗日武装起义官兵亲自护送孙专员登上英国轮船太古号离威南下。在船上我们和理琪同志道别时，我亲自把自己的自卫手枪交给了他，并声明我护送孙专员去武汉，然后去延安，学习归来再见。

一九八五年八月

郑维屏部偷袭刘公岛经过

毕昆山

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在全国敌后战场，各抗日武装力量为更有力地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频频出击。当时活动于胶东文登、威海一带的国民党郑维屏部，为弄到一批枪支，于是年一月十二日夜，成功地偷袭了刘公岛汪伪海军要港司令部等单位。这次偷袭行动，在客观上是对敌伪一次严重打击，在胶东抗战军民中曾传云一时。

当时笔者就在刘公岛汪伪海军练兵营担任班长，耳闻目睹了这一事件；近年来又接触、拜访过几位原参加过夜袭刘公岛的人员。现仅就回忆和交谈所及，简要整理记述如下。

郑维屏在抗战前夕是威海卫管理公署公安局长，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九三八年一月，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七区保安司令兼威海卫管理专员。不久日寇侵占了威海卫，他便率部转入敌后打游击，並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正式成立了保安司令部。在抗战初期，郑部虽然也曾与日本侵略军作过战，但其后来的所作所为证明，完全是一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队伍。郑维屏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以便将来向蒋介石邀功请赏，还与伪治安军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所以老百姓说他们这支游击队是“油饼队”（意即不打日寇，专吃老百姓的油饼）。郑维屏之所以敢大胆地渡海偷袭刘公岛，主要是依靠